

浙籍先进分子群体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研究

李云波¹

(嘉兴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本身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条件。以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邵力子、王会悟、倪忧天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浙籍先进分子, 在早期工人运动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启蒙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引导工人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 积极发起和组织工人运动, 如成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掀起杭州理发工人罢工风潮等, 推动了浙江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陈望道等浙籍先进分子群体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亦彰显了浙籍先进分子在中共创建史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 浙籍先进分子 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 工人运动

【中图分类号】: D235.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2)02-0054-09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 亦是近代新思想和进步社会运动的主要萌发地。中共建党前后, 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活跃在文化界并主要依托报刊、杂志等出版物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 而浙江籍的知识分子又是其中的突出力量。他们重视在工人当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宣传, 关注工人生存状况, 提高其阶级觉悟, 激发其革命斗志, 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浙籍先进分子群体与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 浙江籍的先进分子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凭借上海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和发达的传媒网络, 积极传播新知识、新思想, 尤其通过建立自己的宣传载体和传媒网络, 积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成为早期工人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 浙籍先进分子积极从事新知识、新思想传播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集聚着最广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据 1920 年的初步统计, 上海工人阶级的人数已发展到 50 余万人, 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与此同时, 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亦较他处更为尖锐。据不完全统计, 1919 年下半年, 上海工人罢工达 13 次, 1920 年增加到 56 次, 其中 5 月至 7 月因米价暴涨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达到 33 次。^[1]上海《劳动界》第 22 册则刊载统计, 1920 年, 上海共发生罢工 40 次。^[2]

除了经济社会形态上的独特性外, 作为全国的文化和舆论中心, 上海还是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地, 是中国“社会主义者活动的主要中心”, 在中共建党前后共出版有 300 多种进步报刊, 是当时“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传

¹作者简介: 李云波(1986-), 男, 山东泰安人, 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共创建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J026); 嘉兴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重大委托项目(JSKGH2018077)

播地。^[3]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其成为上海思想文化领域的又一特点。

浙江毗邻上海,与上海趋同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浙江重教育、善创新的人文精神,使大批浙籍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即赴沪求学或留学后回沪谋职,他们逐步在上海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等担当重要角色,亦在诸多的社会进步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他们在上海创办进步报刊,形成了强大的思想影响力和号召力,进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主力之一。

中共建党前后产生广泛影响的进步期刊中,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及《星期评论》都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性刊物,而浙籍先进分子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觉悟》副刊创办于1919年6月16日,由邵力子主编,他在该刊发表的文章约有950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专论马克思主义的,如《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马克思底思想》等。^[4]此外,陈望道、沈玄庐、沈雁冰、刘大白、夏丏尊、施存统等也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星期评论》创办于1919年6月8日,由沈玄庐、戴季陶担任主编,着重研究和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报道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戴季陶在该刊共发表文章139篇,沈玄庐、沈仲九、刘大白分别发表121篇、11篇、10篇,四人文章总数占《星期评论》全部490篇的57%,为该刊影响力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5]

除《觉悟》和《星期评论》外,还有陈望道于1920年全面参与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沈玄庐参与编辑的《劳动界》周刊,俞秀松、宣中华主编的《浙江新潮》、俞秀松协助上海“工商友谊会”创办的《上海伙友》周刊等,都是中共建党前后浙籍先进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舆论阵地,其中如《浙江新潮》还在日本、北京、上海、湖北等30多地设有代派处,尽管其创刊时间不长,却影响广泛。^[6]浙籍先进分子通过这些刊物传播新思想,对进步青年产生了显著号召力,成为“浙江先进青年寻求真理的重要落脚点,五四运动后大批浙籍学生来到上海,都与他们发生了联系”。^[4]

(二)浙籍知识分子通过宣传和教育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

现代革命,只有实现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并逐渐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力量及中国革命的新型领导阶级。^[7]与此同时,从新文化运动中另辟道路的一部分知识精英转而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研究和宣传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劳工神圣”,决心“与劳工为伍”,重点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8]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工人觉悟的第一步,是要认识自己的阶级处境,“要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尽量地宣泄出来,好引起社会的同情”。^[9]浙籍先进分子在向工人传播进步思想的活动中,首先关注的即是工人的生存现状。1920年,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揭露上海纺织企业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指出“一天拿了一角至三角的工银,嘿…嘿…的做十二点钟工,这种好劳动力的卖主哪里去找?有了这种好的劳动力卖主,方才可制造许多剩余价值来,使他们分到40%的红利”。^[10]沈玄庐则在《价值和公道》一文中分析了劳工与资本家在创造价值和享有财富方面的种种不公平:“值价钱的不是东西底本身,是劳动者底工作。所以做工的人要拿工钱的。”但是,“我们自己底工,要他们(行东、厂主、雇主)定价值;由我们的工做出来底货物,也要他们定价值。……我们不能化草鞋钱买布鞋皮鞋,他们倒能够化草鞋工钱来买布鞋皮鞋的工,这不是一樁很蹊跷很希奇的事情吗?”^[11]这些犀利的文字,一方面可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有助于各界进步人士对劳工阶级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除了针对劳工工作环境和生活处境的这些生动刻画和分析,陈望道还明确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阐释劳工运动问题,认为工人与厂主之间的分立,其实质乃是阶级之间的斗争。1921年,在《罢工底伦理的评判》一文中,他进一步分析,“我们所谓争斗是阶级的争斗;……争斗一次,恶劣性多少总可减少一度;争斗强烈一点,那恶劣性多少也总可格外消除一点。所以我们决不反对这意义的争斗。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而且主张,而且顽强地、燃烧地主张。”^[12]这就自然而然地将工人阶级纳入到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范畴,鼓励工人阶级开展坚决的阶级斗争。

除此之外，浙籍先进分子还主张文化界、教育界应利用各自优势积极向劳工开展阶级意识的启蒙和教育，推动工人阶级思想觉悟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变。如邵力子在《劳工底自鸣》中指出：“我们也不能不希望有志改造社会者，各尽其能力，为劳工代作喉舌。”^[9]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创办的《劳动界》周刊正式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之所以创办这个刊物，是因为“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13]为此，陈望道、沈玄庐等人连续在《劳动界》上发表文章，结合工人的生活工作实际，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和团结斗争精神，向工人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张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案来改造社会。如沈玄庐在《什么叫做“非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各人尽各人所能尽的能力，做出有益于人类的东西来，各人得到各自需要的均等的享用；多余的，拿来供大家底老年人，小孩子，生病的。’……凡是地主，行东，厂主，老班，都不说‘是社会主义’；工人，农夫，矿夫，夥友，都不说‘非社会主义’。”^[14]

除《劳动界》周刊为劳工鸣不平、争权益外，《浙江新潮》还主张中国进步青年应在教育和指导劳工阶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在吾国的劳动者，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识文字的人，尚居多数，本报要靠文字的力量，促进他们的自觉和联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以为青年的学生，是中国很有希望的平民，教育劳动者，实在是他们最重要的责任。所以本报一方面直接负促进劳动者的责任，一方面又当鼓吹学生担任教育劳动者的职任。”^[15]

工人的困苦境遇，必然促进其反抗意识的觉醒。对于这些反抗斗争，浙籍先进分子给予了热情的赞扬，称“劳动万能”“劳动神圣”。1920年2月至4月，香港机器工人举行同盟罢工，邵力子评价指出，“这一次胜利，也算是中国劳动者第一次的胜利”，他认为：“香港机器工人多数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此次罢工的道德，真令人料不到，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恐怕也赶不上”。^[16]在赞扬工人斗争的同时，浙籍先进分子还将改造中国的责任寄希望于工人阶级。1919年11月，《浙江新潮》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的；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我们以为劳动阶级，占全世界人类的最大多数，而且都能尽互助、劳动的责任；但是生活的苦痛，唯有他们受得最甚。所以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不能不由劳动者担任。”^[15]这表明，在中共建党以前，浙籍先进分子已初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仰，并决心投入到工农运动的实践中。

二、浙籍先进分子群体对工人斗争策略的引导

为了更好地引导工人开展有组织能力的革命斗争，浙籍先进分子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蒙和宣传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对工人斗争策略的建议和指导，尤其重视工会组织问题，强调知识分子、其他进步团体与工人建立广泛革命联盟的重要性。

（一）积极呼吁成立工会组织

工人阶级受制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只有依靠组织的力量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才能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正如陈望道所言：“劳动者唯一的靠着，就是‘劳动联合’。”^[17]五四运动前后，各地爆发的工人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完全性的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组织强有力的工会组织。

1920年5月，戴季陶在《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上发表《上海的同盟罢工》一文，详细分析了上海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不足，一方面：“质言之，就是没有工会。所以他们的‘同盟’，并不是在平时组织的，大多数都是因为一问题发生，然后才组织一个‘临时的同盟’。这一个临时的同盟，当然组织不容易周密，所以很容易发生‘罢工破坏者’？就是受资本家的运动，先行上工，或是竟不参加罢工，反而妨害罢工的人。于是罢工的行为，不能整齐严肃。”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工会，“平时对于劳动争议，没有预备，没有罢工基金。所以罢工一旦继续到两三天，罢工者已经困难到了不得。即使没有‘罢工破坏者’发生，已经屈服从资本家的要求不可。这是罢工者很大的弱点”。^[18]由此认为，要谋劳工运动的发展乃至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成功，首先就要

有工会组织，“然后各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方才能够协同一致，以继续的普遍的努力，造成劳动者团结的劳力”。^[18]

沈玄庐也很早意识到工会组织的重要性。1919年6月，他在《上海罢工的将来》一文中指出，对于罢工运动，“工人必须有严格信条、合于道德公理、正义的组织”，且“切不可为政客或军人所利用”。^[19]1921年他在《工人有组织团体底必要》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要实现罢工运动的根本胜利，“就要从组织团体做起。团体，大团体，总联合团体，组合好了，那才真是自己底胜利”。^[20]

除了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外，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的代表王会悟亦特别强调工会在罢工运动中的重要性。上海工人数量为全国之最，而“丝厂、纱厂、香烟厂的女工占一半以上”，^[21]1922年4月，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女工因不堪忍受资本家的虐待，举行了长达13天的罢工斗争。罢工斗争发生后不久，王会悟在《妇女声》上指出，工会是劳动妇女阶级争取解放的关键，“当你们被你们的厂主凶恶待遇的时候，你们结团体去抵抗他。这是再好没有的方法了。你们的工会，就是你们团结的中心点。你们和厂主有什么交涉事情的时候，假使你们一个人去是不行的，你们二三十人去也是不行的，因为你们厂主对于你们少数人很容易处置的，他可以停你们的工，他可以另外去找人来代替你们。资本家现在最怕的，就是工人的工会。……工会是你们的命脉，……我们都是无产者，我们要互相携手，互相救济呀！”^[22]

在浙籍先进分子的积极呼吁下，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意识得到明显增强。1921年3月初，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为改善待遇组织罢工，他们说“资本家知道我们工人至今没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无法开展斗争。因此，他们用停工（译注：封闭工厂（车辆））的办法来与我们作对，然而我们是充分地组织起来的，如果他们继续停工，我们将得到电力工人和水厂工人的支持，我们将使这个城市没有光，没有水”。俞秀松等人认为，“这些工人已经有了阶级觉悟，并且了解资本家的伎俩”。^[23]²⁰⁸

（二）倡导工人阶级与进步社会力量结成革命的联盟

工人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高涨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社会各界均应担负起对于劳工阶级的责任。浙籍先进分子认为，尤其要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各种形式以实际行动支持工人运动。邵力子在《劳工神圣》一文中指出，“劳工神圣这句话，要几方面去实行。一面尊重现在为劳动者地位，尽力谋他们的利益；——包括教育经济种种——一面改造现在没有为劳动者的心理，教他们晓得工作的可贵。”^[24]

知识分子除了发表大量文章直接替工人发声外，还应帮助工人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提高他们开展阶级斗争的自觉性、主动性。为此，陈望道曾“到沪西工厂去开办工人夜校，为他们上课，直接向工人群众作宣传鼓动”。^[25]¹⁶⁹此外，文化界、新闻界还要为工人提供发声的平台，倾听来自工人自己的声音。如《劳动界》周刊就明确指出，“对于工人现在的境况，当然尽力调查，尽心记载。但是恐怕我们调查，不能处处都到，一切情形，不能细细采集。所以我们很欢迎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到本报来，本报决计赶快登载。”^[26]

全国各产业工人的广泛联合及社会公众对于劳工阶级的积极声援，亦是工人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一环。戴季陶在分析上海工人罢工存在的缺陷时曾经指出，“没有‘同情的罢工’、‘声援的罢工’，这也是一个大缺点”，“社会一般对于劳动阶级的同情心，非常稀薄。一个同盟罢工的事件发生，言论界和社会公众，对于劳动者不能表同情。所以既不能鼓励罢工者的勇气，而对于虐待劳动者的资本家，也不能加以严厉的批评和惩罚”。^[18]邵力子同样指出，某一产业或工厂的罢工不单是他们自己的事，“实是全体劳动界底事，更是全体中国人底事”。^[27]他呼吁：“青年们快各尽力所能及的罢！还得‘要爽爽直直’，不然，时机一失，便是追悔也来不及了！”^[28]

浙籍先进分子的积极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如1922年初的香港海员罢工，沈玄庐等人的积极声援和各界的支持，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邵力子曾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的大光荣》一文中记录道：

香港海员罢工，前次某报专电，说宁波籍海员没有参加，那时玄庐适来上海，谈及此事，以为这是我们浙江人底奇耻，也是中国劳工底大污点。他就写信给广州香港两处朋友，设法劝告宁波籍水手勿破坏团体。现在他们已有电报到上海，声明华人海员一律参加，并希望各处宁波人概勿受雇。这已是很可欢喜的消息。而尤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特放异彩的，即省工七十万人每人捐一日工资为海员用费。一日工资虽然有限，而精神上直欲团结全劳动界与资本家奋斗。我相信这次海员罢工倘不得胜利，那七十万人必能继续援助，集全劳动界而为一大联合，其精神直超过一切所谓‘职业联合’和‘产业联合’之上。中国劳动界底觉悟能如此迅速，真是可喜可贺！^[29]

三、浙籍先进分子群体与工人运动的实践

浙籍先进分子群体对于工人阶级的启蒙和指导并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将其化为实际的行动，在与工人广泛结合的基础上担负起帮扶和动员的作用。他们不但在上海广泛参加工人运动，还推动了浙江省内早期工会组织的产生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开启了浙江现代革命运动的篇章。

（一）积极推动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

俞秀松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被誉为“自觉、主动地到工厂当工人，走与工人相结合道路的先行者”。^[30]早在1919年，他在参与创办《浙江新潮》时即指出，“等到学生都投身劳动界，那么，改造的目的，就容易达到了”。^[15]1920年3月，他吸取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教训，指出“要改造社会，终不能一时离开社会”，声称自己“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¹不久，他毅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改名换服进入厚生铁厂做工人，尝试在深入调查工人生产、生活和思想境况的基础上，试验其社会主义的新方案并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俞秀松在厚生铁厂的工作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有多种方式去发动工人，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其前提均是要深入工厂、与工人直接地接触，否则工人的觉醒和联合是不可能实现的。有鉴于此，早在厚生铁厂做工期间，俞秀松就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五一节那天，我和其他同志想组织一次游行，没有能成功。但我们还是聚集起了二、三十个人，开了一个短会，这对上海无产阶级来说是第一次”。^{[23][230]}1921年初，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推动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31]俞秀松“主要负责应付流氓，为发展工会准备条件。那时上海流氓很多，很凶，受工部局指使，大流氓就在巡捕房做事。我们要做工会工作，一定要应付这批人”。^[32]正是在不断地实践中，俞秀松逐步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起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始人。

除俞秀松外，曾与他一同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也很早意识到与工人结合的重要性，“我们要改造社会，必须要知道社会底实况，要知道社会的实况，必须要钻到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33]而钻到社会里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钻到工厂里去，“社会革命一定要以工场作战场，如果决计要想社会革命，必定要钻进工厂里去”。^[34]这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开始由抽象地歌颂劳动和在旁边评论罢工斗争进步到想到工人中间去工作了，这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结合的开始，是一个可喜的跃进。”^{[35][205]}此外，陈望道还积极参与上海地区纺织、邮电、印刷三个行业工会的组织工作，^{[36][329]}使其成为“上海党组织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第一批工人群众组织”。^{[25][170]}同时，陈望道曾多次走上街头，配合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活动，或在节假日到上海街头向工人宣传革命的思想。1922年初，他与沈雁冰、陈独秀等七八名共产党员在上海大世界和南市等地向市民散发年卡，卡片反面写着一首歌词，称“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卡片共计“印了一万余张，分送各地工友”。^[37]陈望道后来曾回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36][330]}这种街头的宣传和鼓动，对启发劳工的思想觉悟是一针强心剂，进一步鼓舞了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决心。

王会悟也积极参与到上海各界女工的罢工运动中。1922年5月，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全体工人为争取正当权益发生大规模罢工，王会悟给予有力的支持，她赴日华纱厂女工中去发表演讲，工人听讲者“来来去去者不下二千余人”。演讲中说，“工会

就是为我工人找幸福、谋快乐、保全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工人对于工会，是无论如何，必要维护的，但是厂家他是知道工会不利于他们的，所以他也是无论如何，想要将工会打倒的，在此时就看我们工人与厂家决战的胜败了，我们停一天工，不过二三角钱，厂家停一天工，他就要损失二三万，所以他无论如何，是敌不过我们的，在此时就全凭我们决心，将最近的关头扛过，一得了胜，前途幸福就无量了。望诸位努力齐心，向前进”。工人听罢后备受鼓舞，“掌声如雷”。之后，王会悟又与女工头“作谈话式的演讲”，并随后“到平民窟裏乱穿，去与那些破衣人作演讲式的谈话”，广泛激发工人的革命情绪。^[38]通过王会悟等人的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工人的阶级观念和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扩大了工人运动的群众基础，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

(二)组织发起浙江地区的工人运动

在浙籍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和参与下，浙江省内的工人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五四运动前后，杭州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印刷宣传品和报刊杂志，首先与印刷工人打上了交道，而印刷工人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经常接触进步印刷品的原因，也容易被动员起来。据徐梅坤回忆：“1920年初，我在浙江印刷公司当印刷工人，为了把杭州印刷工人组织起来，我在全城印刷厂、报馆的工人中奔走联络，向印刷工人说明，要组织工会，以增进团结，加强力量。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大多数工人的赞同。”²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0年七八月间，杭州印刷工人倪忧天、徐梅坤、田恺(田庆霖)等在“五四”运动期间“救国十人团”³的基础上，发起组建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旨在促进杭州地区印刷工人的大联合，动员其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倪忧天当选为总干事，“他是这组织中的中坚分子；他于这组织的成立及曲江工潮的扶养，都有莫大的功劳。……这种诚挚，勤恳，而有毅力的人，是我所少见于工人中及平日朋友中的”。^[39]

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成立后最重要的成绩，就是于1920年12月创办了互助会刊物——《曲江工潮》半月刊，以揭露反动势力，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识为宗旨，不但是浙江第一份工人刊物，还是全国最早的工人阶级刊物之一。该刊每月印一二百份，共发行了14期，先是聘浙江第一师范学生钱耕莘(耿仙)担任主编，后又聘请浙江第一师范魏金枝、陈乐我接任。^[39]从目前仅存的第三期内容来看，该刊有着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强大的鼓动力，如倪忧天的《工人解放底先决问题》、查猛济的《工人教育底目的》、义璋的《劳动和文明》、慎予的《仇人与恩人》等文章，都具有鲜明的阶级观点，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改造旧社会，并向工人介绍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40]另据徐梅坤回忆，《曲江工潮》通过多个方面来传播新思想，“有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罪恶与黑暗；有的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有的宣传无政府主义；有的宣传学文化；也有的提倡女权；还发表一些小说和诗歌。《曲江工潮》当时曾轰动了江浙地区。”⁴除了创办刊物外，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还时常邀请施存统、宣中华等进步分子来给工人作时事讲演，倪忧天说：“以我现在眼光看来，这就是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正由于这样，激发了不少工人的觉悟。”^{[41]2}

《曲江工潮》创刊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据《中华实业丛报》评价，“曲江工潮，为工界之明星，劳动家读之，可以增长知识，灌输文明。资本家读之，可以改进思想，顺应潮流，以博美誉。”^[42]另据学者研究指出，《曲江工潮》在当时浙江众多介绍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中独树一帜，“从而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受到进步力量的好评”，上海《民国日报》就曾对该刊作过几次报道，赞誉其办刊成绩。^[43]

1921年11月，由于劳资双方矛盾加剧，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遭到公司资方非难，不久被强行解散，《曲江工潮》在出版14期后终刊。尽管如此，互助会骨干成员并没有因此停止活动，“工界中人，和一切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同志，加以研究，加以卷土重来的精神，再来联合”。^[39]如徐梅坤曾改名换姓到浙江省立贫民习艺工厂当艺徒，在沈玄庐的支持下，他“带领艺徒们到省议会去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并最终取得了胜利。1924年初，倪忧天在杭州联合部分印刷工人、排字工人约50余人发起成立“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参加反对地方军阀的斗争，在军阀通缉名单里，“有十七人是我们印刷工人俱乐部部员”。^{[41]3-}
⁴到大革命时期，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成员已大多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者，上海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多系从杭州转过去的”。

^[44]37

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是浙江最早的工会组织，亦是我国第一批出现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⁵其成立时间几乎同步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其组织章程、活动情况和发展方向，在同时期的工会组织中是无与伦比的”。^{[44] 36-37}更须注意的是，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还承担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宣传品印刷工作，“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品，时常通过他(徐梅坤)去印刷。”⁶换言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曾受到上海浙籍先进分子的重要影响，如施存统、宣中华等都曾为办好《曲江工潮》作出重要贡献，^[43]徐梅坤等人还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

除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的进步活动外，在浙籍先进分子的参与和支持下，1921年5月，浙江还爆发了著名的“杭州理发工人罢工风潮”，24日，杭州理发工人向雇主提出关于改善待遇的五项条件，却被理发店雇主捉拿殴打并告到官厅。^[45]对此，工人提出“一天不答应，一天不上工。他们现在去告我们了，听说要把我们代表都拘留起来。我们主义打定了，要是果真这样，我们一千多朋友都愿意一同去坐”^[46]，由此标志着工人已经开始觉悟了，“知道团结，奋斗，和人的幸福了!”^[46]5月27日，杭州警察厅在审理此案中庇护理发店雇主，工人决定进一步向省议会请愿，请愿无果后又相约脱离理发店，自行外出低价招揽生意；同时印发了《杭州理发工人全体泣告书》，以征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其“泣告书”中写道：

朋友们，人们生在上世，不谁都当有生存权吗!我们却是例外!——没有生存权!——也许我们不是人吧!资本和强权，高高压在我们头上!

朋友们，痛苦向谁诉呀!——不诉向和我们同感痛苦的朋友们，向谁诉呀!

我们终日辛苦的收入，店主却安安闲闲地掠去十分之六!虽供给我们仅得生存的饭，菜蔬却每人只给三十四文，朋友们，扣心想，怎样下饭!理发器具，概由我们自备，毫没津贴!朋友们，看，叫我们怎样度日!——有父母妻子的，更怎样度日!

我们不能忍了!不能不要求了!但很微!只：饭菜概由店主供给；每天每人津贴理发器具费四十文。

奇事!——也是极平常的事!店主不但不允所求，且靠着金钱和劳力来毒打我们、拘留我们!现在，在着拘留所里的，已有三四十人呢!

朋友们，不救救可怜的弱者的我们吗!我们一齐仰着首，盼朋友们底亲爱的援助!^[47]

虽然该“泣告书”仍多停留在改善待遇等经济方面的问题上，但已展现出一定的阶级观念，并提出了联合起来的想法。《民国日报》投稿作者铁郎认为，这些显然受到了进步分子的影响，甚至直接参与进来，曾发表许多谈话和演说。^[48]另外，中共中央编译局也研究指出，从行文来看，也基本可以断定这是出自知识分子的手笔。^{[35] 206}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发动工人，必须在语言上更加贴合工人朴素的用语习惯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我们不愿与劳动界携手则已，如果愿意与劳动界作一致进行，这种相同的工具，大非研究不可。但又非闭户可以独撰，必须深入贫民窟里劳工丛中才能了解其运用和意义!同志们!去罢!”^[48]

这次“破天荒的罢工风潮”持续到5月30日结束，最终被警庭拘留的三四十名工人被释放。在权益诉求上，“以前只肯加五个钱的，增加到十个了；主使毒打工人的雇主——马玉龙——也判决拘留四天了”。这只是工人斗争的初步胜利，但工人们从此明确了革命目标和策略，坚定了革命意志，“他们都想到这回所以受尽雇主底虐待，是因为自己没有团体之故；人人都是散沙一般的，哪能和店主们对抗?所以他们决定暂乘这机会告个段落。罢工底事了结后，他们就着手组织理发业工会。这是杭州底明星呵!我们盼望一天明亮一天!”^[49]

总之，中共建党前后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最初探索。以陈望道、俞秀松、王会悟、倪忧天等为代表的浙籍先进分子不仅开展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还积极领导上海、杭州等地区的工人运动，对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斗争意识，以及扩大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阵营作出了重要贡献，亦奠定了他们在中共创建

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工运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80.

[2]陆米强. 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党与上海工人组织[M]//俞克明.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 第6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248.

[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45.

[4]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浙江党史: 第1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70.

[5]杨宏雨. 《星期评论》作者群研究[J]. 理论学刊, 2018(3):146-155.

[6]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共党史人物传: 精选本8(民运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224.

[7]学生联合会消息: 慰问商工界[N]. 民国日报, 1919-06-13(10).

[8]邵维正. 建党前后的上海工人运动[M]//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3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69.

[9]力子. 劳工底自鸣[N]. 民国日报·觉悟, 1922-09-17(4).

[10]季陶. 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上海的劳动条件如何?[J]. 星期评论, 1920(35):3.

[11]玄庐. 价值和公道[J]. 劳动界, 1920(7):1-2.

[12]望道. 罢工底伦理的批判[N]. 民国日报·觉悟, 1921-03-06(1).

[13]汉俊. 为甚么要印这个报?[J]. 劳动界, 1920(1):3.

[14]玄庐. 什么叫做“非社会主义”?[J]. 劳动界, 1920(12):1-2.

[15]《浙江新潮》发刊词[J]. 浙江新潮, 1919(1):1.

[16]朱顺佐. 邵力子传[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8:144-145.

[17]陈望道. 劳动者唯一的“靠著”[J]. 劳动界, 1920(17):1.

[18]季陶. 上海的同盟罢工[J]. 星期评论, 1920(劳动纪念号):1.

[19]玄庐. 上海罢工的将来[J]. 星期评论, 1919(2):4.

-
- [20]玄庐.工人有组织团体底必要[N].民国日报·觉悟,1921-03-18(4).
- [21]邵雍.中华女界联合会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31-139.
- [22]会悟.对罢工女工人说的话[J].妇女声,1922(10).
- [2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俞秀松纪念文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 [24]力子.劳工神圣[N].民国日报,1920-02-07(11).
- [25]陆米强.现代革命史料研究文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 [26]本报欢迎工人投稿[J].劳动界,1920(2):1.
- [27]力子.应当怎样援助香港海员呀[N].民国日报·觉悟,1922-02-02(4).
- [28]力子.帮助劳工的好教训[N].民国日报·觉悟,1922-05-25(4).
- [29]力子.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的大光荣[N].民国日报·觉悟,1922-01-22(4).
- [30]杨福茂.俞秀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贡献[J].中共党史研究,2000(5):77-81.
- [31]本社编.一大回忆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29.
- [3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
- [33]存统.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中去[N].民国日报·觉悟,1920-04-11.
- [34]存统.“钻进工厂里去”的解释[N].民国日报·觉悟,1920-04-16.
- [3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 [36]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G].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 [37]太平歌[J].工人周刊,1922(29):4.
- [38]日华纱厂罢工四志[N].申报,1922-05-24(13).
- [39]金枝,佛突.工人底借鉴[N].民国日报·觉悟,1921-11-27(4).
- [40]黄梅英.五四运动与“一师风潮”[M]//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一师风潮.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488.

[41]倪忧天. 杭州印刷工人初期活动[J]. 杭州党史资料, 1982(3).

[42]介绍曲江工潮[J]. 中华实业丛报, 1921(3):3.

[43]浙江省总工会. 浙江工人运动史[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48.

[44]张亦民, 尹福瑛. 用建党原理剖析浙江先进分子在中共创建中地位与作用[M].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浙江省纪念建党八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45]吴静. 杭州理发工人底罢工风潮(一)[N]. 民国日报·觉悟, 1921-05-27(1).

[46]下天. 杭州理发工人底罢工风潮(二)[N]. 民国日报·觉悟, 1921-05-27(2).

[47]吴静. 杭州理发工人底罢工风潮(三)[N]. 民国日报·觉悟, 1921-05-29(2).

[48]铁郎. 各阶级用语底沟通[N]. 民国日报·觉悟, 1921-06-08(1).

[49]吴静. 杭州理发工人底罢工风潮(四)[N]. 民国日报·觉悟, 1921-05-31(1).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 内部资料, 1983年, 第111、113页。

2 徐梅坤:《九旬忆旧》,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党史资料》1985年第2辑, 内部资料, 1985年, 第4-5页。

3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田恺(田庆霖)、陈德高和倪忧天等七八人组成了一个“救国十人团”, 负责人是倪忧天。规定每人每月出资两角为爱国办厂经费, 并与师范学校搭上关系, 由他们供给讲演资料。他们的活动地区是在三元坊到保佑坊一段, 每次带一张条凳, 站立上面, 手里拿着一面写有“救国十人团讲演队”字样的三角旗, 宣传内容主要是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该组织前后不过存在三四个月, 倪忧天、吴祥仁到街头先后作过三次讲演。参见倪忧天:《杭州印刷工人初期活动》, 《杭州党史资料》1982年第3期, 第1页。

4 徐梅坤:《九旬忆旧》,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党史资料》1985年第2辑, 内部资料, 1985年, 第5-6页、第7页。

5 目前学术界一般公认较早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和湖南黄爱、庞人铨创办的劳工会, 都在1920年11月成立, 参见浙江省总工会编:《浙江工人运动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46页。

6 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合编:《中共“一大”资料汇编》, 内部刊物, 1979年, 第204页。